

# 公共决策 须主动、提前让公众参与

## 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做学问,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慕官位。科学是求真务实的学问,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哪怕一点成绩,都要下很大功夫。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就应立志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成绩,脚踏实地工作,不为窗外的荣华富贵所诱惑。在这方面,范文澜先生和罗尔纲先生可称得上是我们的榜样。上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告诫新来的年轻人,要理头学问,不要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史所不过一百来人,所长只相当于部队的连长,要当官何必来当连长呢。这是玩笑话,寓意却很深刻。罗尔纲先生也是这样。他在南京一手创办了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当南京市正式任命他为馆长时,他坚辞不就,宁愿到近代史所做一名普通的研究员。后来,他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虽不能辞,遇到活动却很不适应。而对于学术研究,他却始终追求,终身不悔。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才造就了一代大学问家。

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时下流行一句话,叫“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说这是范文澜先生的话。其实这不是他的原话。范文澜先生在近代史所提倡的是,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精神。坐冷板凳、“吃冷猪肉”是一种借喻,借喻古时庙堂上的祭祀活动。古人学问成就高了,可以入先贤庙,接受后人的供奉,也只能“吃冷猪肉”。这里指的是身前不图名,图的是身后名。学术研究,就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有守住清贫的心理准备,在坐冷板凳中追求真理,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

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由博入专,不可急功近利。罗尔纲先生在回复一位研究中国文化史的青年的信中,强调“做学问‘要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大处着眼,为学方不致流于琐碎,而有裨益于世。能小处下手,方不致流于空谈。所以千万不要追求速效,要花三四十年的功夫,积累史料和增进知识的功夫,然后以三四十年的研究功夫,断断乎会有大成就的。”这些话,今天看来还是非常切中时弊的。在为学之道上,切不可急功近利,追求眼前利益、短期效应。时间飞逝,时代变化,读了四十年书以后再回来写作,在今天已经难以做到。但罗先生认真读书、认真写作的精神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科学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科学家必须是诚实的人,容不得半点造假的行为。抄袭、剽窃,是懒汉,是懦夫。想在学术上求得进步,就要远离抄袭,杜绝剽窃。我们要对学术成果的发布抱着敬畏的心情,抱着谨慎的态度,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精神。  
张海鹏

北京一家医院被曝向全体医师下达命令,要求病人医保定额消费的10500元里,有盈余则奖励,超出消费额则扣医生钱。(《京华时报》)

## 让医生“挑病人” 这算什么激励机制?

当医院将医保额度与奖金挂钩,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医生就很难做到不去挑病人。有同行吐槽,年纪大的病人不愿收,有多种病的老病号不收,以免医保超标。住院的病人,一旦医保额度将超标,医生会动员病人快出院。

病人可以挑医生,但医生不应该挑病人,否则后患无穷,这是一个常识。虽然历来有纸面上的各种明文规定,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挑病人”却屡见不鲜。

因为这种激励的存在,在同一家医院,虽然是患同样疾病的病人,但因为医保含金量不一样,得到的也是不同的对待。对那些疾病复杂的病人,住院时间过长,往往会造成额度超标,让医生被扣钱,拿不到奖金,所以自然人见人弃。即使明明有床位,也被婉言告知,客满了,请选择另家。

我们得想想,医保控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看起来是为了避免医保资金的浪费。而再进一步看,还是在保障资源储备,不至于令医保账户因过度浪费而亏空,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保障。但现在,那些最需要医疗保障和资源的人反而受到了最大的限制,得到了最狠的伤害,住不进医院。这是否有违初衷?

医保额度超标,一刀切地惩罚医生,实际上也不科学。部分超标,的确可能是医生“大手大脚”,不精打细算所致。但还存在另一种超标,是因为病人病情复杂、患多种疾病,或者病情恶化、导致住院时间长所引起。当医生尽心尽力的抢救病人,却因此收到罚单,它是否公平合理?

奖励控费得力、会节约成本的医生,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也不排除有一类医生,专门投机取巧,悄悄地只收经济价值高的病人,即使同样是浪费,他们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奖励。利益最大化的方案总是被默不作声的选择,这是常见的现象。问题不是投机取巧,而是鼓励和肯定它,最后让公共利益受到伤害。

应该奖励还是惩罚医生?避讳的是一刀切。医疗的特点本来就是复杂多变,难以预测的。开小处方的医生,也有可能不是合格的医生,如果没有负责责任的考虑周全病情;手上死最多病人的医生,很有可能是医疗技术精湛的负责人,因为他总是去接诊风险最高、病情复杂、别人不愿接诊的病人。医生处方导致产生的医保额度大,究竟是浪费还是必要?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奖励或是惩罚,都应该是综合全面的因素,公正合理的去判断筛选。

医保控费本来是好事,但如果过于极端的一刀切,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反成坏事。对此,相关部门应每人看病合理花费不同,严禁医院平均分解指标给医生。这是很及时与必要的表态。但光是表态肯定不够,还得配上执行力,才能改变这种短视有害的选择。  
吴帅

近日有两条新闻:《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正式实施,作为全国第一个城市治理条例,设立“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可谓是一大亮点;委员会由公务委员和公众委员组成,其中来自普通民众的“公众委员”不少于50%。而日前,盐城突然传出天然气要涨价的消息,“公民权力”阶段。按照这一理论,我们离最理想的那个梯子还有距离。

公众参与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公众参与一定要信息公开。第二,公众参与必须要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第三是反馈,没有反馈的公众参与就是表层的参与。近日,铁道部和环保部一个拒绝公开12306招标信息,称“不属于铁道部信息公开范畴”;一个拒绝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称属于“国家机密”。这两件事情引发如潮质疑,是没有处理好公众参与与的典型反例。

再说说我们熟知的“听证会”制度,这被很多部门称为“公众参与”的理想方式,但很多时候“听证”被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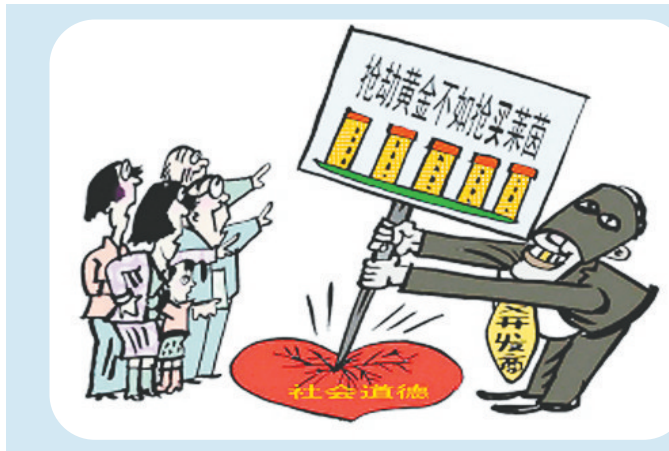
美国学者谢里·阿恩斯坦曾提出“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在梯子的最底

端,公众完全没有发言权,处于被操纵或被教导的地位;再往上,公众获得了一定的知情权和信息,政府决策机构会向公众征求相关的想法和意见,但最终决策权仍不属于公众,这是“象征性参与阶段”;梯子的顶端则是进化到公民代表控制和公民控制,这属于“公民权力”阶段。按照这一理论,我们离最理想的那个梯子还有距离。

随着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进步,公众的参与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无论主动被动,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都对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有莫大的价值。“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做老百姓想要做的事”,中央的这个要求正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而积极、提前、主动去接洽“公众参与”,是践行这种共识的有效手段。

南京的城市治理条例正式生效,这也是检验公众参与的试金石。我们希望这种参与是真正的不带水分的参与,能让南京在城市管理上不仅仅只是“率先立法”而已。  
周建平

## 广告岂能口无遮拦



“抢劫黄金,不如抢菜茵。”这则雷人的楼盘广告,在接到群众投诉后于日前被泰州工商部门叫停了。(《新华日报》)

广告之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眼球。但挣眼球也得守底线,最起码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口无遮拦,大言“抢劫黄金,不如抢菜茵”,莫非抢劫黄金是能够容忍的什么好事?莫非没买到房或买不起房,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去抢劫黄金?这样的广告,该罚!

王成喜/图 刘庆传/文

## 公路里程也“缺斤少两”

近日,知名律师甘元春质疑湖南境内部分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缺斤少两”,有的虚加里程高达44%,涉嫌乱收费。

实测距离为28.5公里,却按41.1公里计费,高速公路的解释是收费里程为主线与匝道、连接线长度之和。可正如网友质疑,连接线并非每位司机都要经过,为何都要计入收费?收费应该是明白账,“缺斤少两”,不该收的也收,这诚信往哪里摆?  
曹一/图 刘庆传/文



## 按“颗”卖药不妨在全国推广

“去药店买药,一买就一整盒,吃不完的就浪费了。”张女士刚刚从家里药箱中清理出一批过期的药品,都是几年前生病时没吃完的。日前,记者从长沙市政府办公厅获悉,《长沙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实施细则(暂行)》已经发布,将自2013年3月19日起实施。其中指出,营业场所应设立拆零专柜,并配有拆零工具及专用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潇湘晨报》)

市民家里之所以有药品用不完、放过期的现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者当初选购药品的时候,只能整盒、整瓶或者是整包的购买,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按“颗”零买。

此次《长沙市药品零售企业设置实施细则(暂行)》,其中最值得消费者关注的,就是关于社会上的药店、诊所等营业场所,必须设立拆零专柜,允许消费者按“颗”买药的规定。为了让这一实施细

则能够得到更好的落实,《细则》还规定,药品营业场所除了应设立拆零专柜之外,还必须配有拆零工具以及专用的包装材料,并且专柜、工具和包装材料都应该保持清洁卫生。这样的规定,就有效免除了一些消费者担心拆零买药的卫生、安全问题,解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

很多人去药店买药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药店的营业员为了多卖药,总会向消费

者极力推荐更多的药品,这也是造成市民家里药品过剩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药店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督促他们提高社会责任感,自觉维护消费者的利益,而不能唯利是图。

既然按“颗”买药在各方面都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就不妨让这一举措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走出长沙的药店,走出湖南,走向全国各地。  
苑广阔

## 不能让爱美的女人很受伤

今天“三八”妇女节,美容、美体等促销搞得火热。在一个星期之内,工商部门接到此类投诉多达20起。很多消费者在美容院里做皮肤护理时,美容师推荐打瘦脸针,事后因为瘦脸针有问题变成了“僵尸脸”。(《徐州日报》)

爱美之心有三大原因。一是迫于无奈。这是社会环境使然,在招聘中,在提拔中,往往会有这样的门槛:身体多高,三围多少,面容如何。当有丑女连清洁工都应聘不上来的时候,当大学生为求职卖肾整容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这些“被迫爱美”的女同胞和社会流下眼泪。这是社会导向偏离了轨道,真的不是她的错。

二是源于心态。一些女孩被自己如同“洁癖”般的爱美之心所累。其实她,你咋看她都算不上什么“无敌的丑女”,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的,而且综合到一张脸上吧,还都是那么的“摆放有序”。可是由于被完美的心态错

刀痕,隆鼻弄成了龙鼻……超女王贝整容意外死亡就应该是个警醒。

当然,无论爱美的女人的爱美之心源于什么,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去指责她们,而要多为她们减少伤痛;社会的原因,我们自己要整改;心态的原因,我们要引导;现实之需,我们要打击非法美容机构,给她们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美和丑也要辩证看。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一种美;心灵高尚、善心闪耀何尝不是一种美。再说说的时候吧,丑女真的可以无敌。2012年评出的美国首位女性司法部长雷诺等世界10大丑女都是政坛、商界、艺术圈里的佼佼者。潇洒“丑”一回又何妨?

在追求美、享受美、欣赏美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让爱美的女人很受伤。  
郭元鹏

当今的社会热衷于“造星”,而时下的公众更喜欢“追星”,追球星、追歌星,不一而足。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央视感动中国的忠实粉丝,更喜欢追其中的“明星”。

## 追追感动中国的“星”

2012年度感动中国可说是“明星”云集,星光闪耀。有舍生忘死救学生的最美教师张丽莉,卧底潜伏为百姓的民工局长陈家顺,用生命托起战机的航天英雄罗阳,情注大漠铸核盾的科学巨人林俊德……仔细查阅这些“明星”的详细信息,竟然都有一个共同的党员身份,而且占据感动人物的半壁江山。

于是,好奇之心顿起,对2002年以来的历届感动中国人物进行盘点,发现其中的“党员明星”还真不少。2002年“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的郑培民,2003年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杨利伟,2004年甘当百姓孺子牛的牛玉儒……2009年小岗村贴心人沈浩,2010年被誉为民雷雷锋郭晋芳的郭明义,2011年坚守共产党员精神家园的杨善洲。在时间河流中,这些优秀党员,如一颗颗璀璨明珠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似一串串跌宕起伏共奏出壮美乐章。他们用执着的坚守、无私的奉献,树起一座座共产党员的精神丰碑。

感动中国作为央视倾力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以震撼人心、感动中国的人物为主打内容,而每届入选人物中有如此之多的党员,看似偶然,实则包含众多必然因素,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内核”在一代代共产党人中的传承与光大。从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直至今日,共产党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论时代如何变革、岁月如何变迁,但共产党人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意识始终没有变,一直在传承。

感动源于付出,先进凝聚力量。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的先进政党。追求先进和优秀的精神在一代代共产党人身上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任长霞查处积案,连破大案,保一方百姓平安。孔繁森两次进藏,情系藏民,把一生奉献给西藏。沈浩六载离家,两任村官,带领小岗村村民脱贫致富……这些优秀党员,似一面面旗帜、一个个标杆,共同淬炼出平时能够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危险关头豁得出的共产党人精神。这也是最能打动人心、最能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追星的时代。有一句话说“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感动中国人物身上闪烁着人性光辉、党性光芒,是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追追感动中国的这些“时代之星”。  
中华

莫言的诺奖效应蔓延到了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赵丽宏建议在中国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以争夺更多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他甚至已为这个奖项想好了名字,就叫“李太白世界文学奖”,而且赵丽宏建议这个奖不由作协组织,由非官方基金会来承办,要做成“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3月4日《南方都市报》)

## 当李太白遇上“世界文学奖”

对于一名身为作家的政协委员,提出设立文学奖的建议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提议既符合其作家的身份,同时也可以借此高谈阔论一番。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赵丽宏委员的想法或者出发点都是好的,设立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争夺世界文学界的话语权,这何错之有?当然没错。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奖不由作协组织,由非官方基金会承办,同样没错。

既然赵丽宏委员的想法没错,可为什么这个“李太白世界文学奖”会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我想问题恐怕是在于“标题上”,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个文学奖和李太白联系起来,就变得有些不今不古,不中不外了。

孔子不是文学家,屈原命太苦,杜甫又太悲催,所以赵丽宏先生把“李白”请了出来。可问题出来了,李白先生与世界文学之间还真没有太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之所以用“李太白”冠名“世界文学奖”无非是突出这是中国设立的一个奖项而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要在国内设立一个“世界文学奖”,论世界影响力,莫言恐怕要比李太白更有知名度。所以与其叫“李太白世界文学奖”还不如叫“莫言世界文学奖”。

中国文学当然需要走向世界,需要争夺话语权。但话语权的争夺依靠的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不断出现,而不是靠设立“李太白世界文学奖”就能实现的。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李太白世界文学奖”?如果仅仅是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个想法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其实不乏所谓的“世界文学奖”,“世界华文诗歌大奖赛”、“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哪一个不是国际视野?可哪一个能有诺贝尔文学奖那样的世界级影响力?

中国过去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现在有了。可也不必非得弄一个“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出来。一方面,“李太白世界文学奖”即使真的设立了,那也是一个新奖,影响力根本没办法和诺贝尔文学奖去比。另一方面,我担心在文学奖泛滥成灾的国内,这“李太白世界文学奖”会曝出抄袭、贿选或者乱发奖项的丑闻出来。到那时候,恐怕李太白先生都跟着抬不起头来。  
关东客